

浚县泥咕咕的符号流变与当代文化重构研究

李林美

天津美术学院

DOI:10.12238/pe.v3i4.15106

[摘要] 本文以豫北民间泥塑“泥咕咕”为研究对象,探讨其从祭祀器具到文化符号、再到商业产品的符号流变过程,揭示民间艺术在社会变迁中的意义重构机制。研究梳理了泥咕咕符号流变经历的三个历史阶段:从作为祭祀、农耕载体的“实用符号”,到承载戏曲神话叙事的“民俗符号”,最终演化为融合现代审美的“商业符号”,这一演变过程既映射出了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更彰显着民间艺术通过符号转译实现文化传承的内在生命力。在当代语境中,泥咕咕通过“萌化”、“品牌化”等策略完成传统基因的活性传承与文化语义的现代重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传承提供经典范式。

[关键词] 浚县; 泥咕咕; 符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G09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Symbolic Evolution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of Xun County Nigugu

Linmei Li

Tianjin Academy of Fine Arts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Nigugu", a northern Henan folk clay sculpture, analyzing its symbolic evolution from sacrificial artifacts to cultural symbols and commercial products. It reveals the meaning –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folk art in social change, categorizing the evolution into three phases: pragmatic symbols for sacrifice and farming, folkloric symbols of opera and myths, and commercial symbols blending modern aesthetics. This evolution reflects social structural shifts and showcases folk art's resilience in cultural transmission through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modern era, Nigugu revitalizes traditional elements and reconstructs cultural meanings via "cutesification" and branding, offering a model for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ctivation.

[Key words] Xun County; Nigugu; symbo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引言

泥咕咕发源于河南浚县,是胶泥捏成的可吹响的儿童玩具,因中原有“尚鸟”传统,众多题材统称“泥咕咕”。在通体效果上,传统泥咕咕以“黑底彩绘”的鲜明配色、洒脱而夸张的动态比例、凝练流畅的纹饰为视觉符号,其古朴奔放的造物手法充分体现了中原艺术特色(图1)。现代工业化发展使泥咕咕不仅在上色、纹饰和制造上融入了更多当代手法,而且创作题材也成功扩展至大众流行文化中。纵观历史,从隋唐车马到现代工业化浪潮,从庄严祭祀到治愈系玩具,泥咕咕以稚拙的造型语言讲述了中原千年社会图景,以包容的态度并蓄了时代文化的洪流,成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哲学观与民俗信仰的微缩镜像。

1 符号流变的历史脉络:从实用工具到文化载体

目前对泥咕咕的起源,大部分研究偏向始于隋唐时期,但根据专家张新词的研究和史料记载,我国的泥塑、木制玩具在

东汉时期已经初具规模并有相应的商业流通。而且东汉的书籍《潜夫论·浮侈篇》中记载:“或做泥车、瓦狗、马骑、倡俳,诸戏弄小儿之具以马巧诈”^[1]。这一史料虽是讽刺泥塑玩具的俗气之风,却揭示了中原地区泥塑玩具在汉代便已形成流通雏形,以泥土塑性造物这一基础也为泥咕咕的符号化发展埋下伏笔。

1.1 祭祀功用与农耕信仰的结合

在早期,泥咕咕由隋末战争的祭祀功用而得以发源。黎阳仓战役后,瓦岗军许多将士英勇牺牲,但隋末战乱导致青铜、陶器等传统祭奠器物制作中断,于是便将浚县地区特有的黄河胶泥作为替代性媒介,就地取材捏造出人物简形作为“招魂”功能的象征物。这种以泥土为媒介的集体祭奠行为,不仅是特定历史事件的物质遗存,而且在物质匮乏的战乱年代实现了精神慰藉与文化遗产的双重功能。



图1 王蓝田所作泥咕咕 图片来源: 百度百科

除了祭祀功能外,泥咕咕的文化符号还与中原地区的鸟图腾信仰密切相关。“泥咕咕”这一命名便可解读出古代的尚鸟渊源:在中原地区粮食收获的季节,斑鸠会频繁地发出“咕咕”的叫声。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常祈愿风调雨顺、粮食保收,因此直接用斑鸠的叫声“咕咕”来对泥塑命名,既体现斑鸠的声音特征,又通过拟声词强化其与自然的关联,充分包含了先民对丰收的祈盼。除了将斑鸠与丰收关联,泥咕咕的其他创作符号也有着意义丰富的所指:燕子象征着繁衍后代、人丁兴旺;麻雀象征多子多福;大雁隐喻白头偕老、忠贞不二等,各种意义均是与生活安定息息相关的,是人们朴素愿望的真实投射。

1.2 符号化的民俗叙事

唐至明清时期泥咕咕的创作发生了较大转向,所涉及的题材种类逐渐丰富,向着民俗性和艺术性发展:有飞禽、骑马人、六畜、狮虎、英雄人物、麒麟龙凤、神话人物等,从前庄严祭祀的功能逐渐被民俗文化和吉祥如意所取代,其背后原因直指国家安定与社会繁荣,亦与宗教兴盛密不可分。

唐代佛教兴起,浚县的古庙会开始成型,泥咕咕的制作与售卖在庙会上也形成一定规模,当时主要被广泛用于寺庙神像和戏曲人物塑造,如三国人物、西游记人物、白蛇传人物等,受到大众的欣赏和欢迎,民间的泥塑审美也于此开始萌芽。宋元至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开始初步发展,市民阶层文化逐渐兴起,泥咕咕的创作题材更加丰富;元代末浚县的水灾平定,浮丘山庙会规模化发展,泥咕咕的传承又一次由庙会带动起来;明代后,杨屯村成为泥塑制作中心,开始了生产专门化发展,泥咕咕通过庙会广泛传播,成为地域文化符号^[2];清代的社会繁荣稳定,康熙年间,统治者为了淡化佛道界限,便在大坯山修建了吕祖祠来吸引浮丘山的人流,浚县庙会颇为兴盛,泥咕咕成为人们求子祈福的物质载体。在这五个时期,社会的安定和对宗教信仰的推崇促使了泥咕咕的文艺符号趋向大众文化和美好隐喻的方向发展,早期的庄严的祭祀功用基本被取代完毕。

1.3 非遗符号的现代重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物质生活的充裕,现代人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迁,犹如先民对泥咕咕的创作从祭祀目的转向民俗文化一样,现代泥咕咕不再局限于传统主题的表现范畴,变得贴近现代生活了,向着时事化和流行化方向发展。2021年在全国抗

击疫情阶段,泥塑艺术家王红瑞结合当时的“绿码”创作出了“我是绿马我怕谁”的系列泥塑作品,不仅拓宽了非遗文化的创作领域,更以诙谐轻松的方式贴近了人们的心声,引发大众对民间艺术的认同和关注。在流行文化方面,郑州大学的“咕咕探新队”在浚县开展非遗传承活动时,发现儿童对于泥咕咕的传统造型兴趣有限,因此引导孩子们结合流行文化进行创作,孩子们将动画片《奶龙》中的角色融入泥咕咕中,捏制出憨态可掬的奶龙形象,既保留了泥咕咕的夸张造型特色,又贴合现代儿童审美。

2 泥咕咕的发展困境

90年代末至今,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飞速更迭,在Z世代引领的新潮文化冲击下,失去解读语境的传统文化和技艺面临着不同形式的代谢。新的社会消费模式也为泥咕咕等传统艺术带来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2.1 生产模式与传承生态的鸿沟

泥咕咕被列入非遗名录之后,其传承人分级制度便于人才管理和技艺传承,也确定了泥咕咕重要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但也要考虑非遗认定后泥咕咕的制作和市场销售会遇到的困境:非遗大师所做产品会被文化符号化和市场专有化,成为泥咕咕的欣赏和传承范例,市场中天然形成以大师风格为导向的价值认同,他们所作的泥咕咕售价自然高于普通艺人许多,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普通艺人的传承话语权^[3]。“大师手笔”的流传自然对提高泥咕咕的知名度有着重要影响,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绝不能止步于精英化生产模式,要看到普通艺人的创新和创造也是民族文化发展不可忽视的力量。

2.2 传统符号的现代解码偏差

由于泥咕咕传统符号意义所依赖的语境已经消失,当下年轻的消费群体对于泥咕咕的传统符号认知大多停留在视觉层面,例如,将“黑底彩绘”单纯地视为复古风,而非理解其中的深层文化逻辑(中原文化的尚黑传统),导致符号意义的扁平化消费。在创作实践中,部分艺人也并未深入挖掘与延续其背后的文化基因,而是将传统元素进行碎片化拼贴,使“文化重构”仅仅沦为噱头。在商业化导向下,泥咕咕趋于娱乐化、轻量化符号生产,更加偏向可爱、解压的“萌系”造型,传统文化中敬畏自然等内涵被边缘化,文化逐渐让位于消费的快感。

2.3 民俗功能的剥离

工业化生产模式对传统手艺有着覆没的趋势,加之部分手工艺人急功近利,一些作品为追求利润而牺牲了地域文化特征,丧失了部分民俗工艺的特性。例如,传统泥咕咕能拿在手里把玩的同时,尾部还能吹响,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样的玩法十分有趣,但当下脱离了纯粹的乡土语境,一些泥咕咕的制作甚至省去了吹奏的哨子部分,沦为纯粹的装饰品,从“可玩的生活符号”退化为“可看的文化标本”,有着变成纯粹的文化符号和审美符号的趋势。

3 基于符号复兴的创新策略

非遗活化的过程面临着动态的社会语境,在文化洪流中,泥咕咕要始终保持两个符号创新原则:首先保持“符号核”的稳

定性,例如胶泥材质、夸张造型的保留,在“符号壳”,即泥咕咕的表现形式上动态更新;其次,传承人要警惕过度商业化导致的符号空心化,不断批判思考如何平衡文化本原性和市场适应性。在创新原则的具体实践中,可通过以下路径实现泥咕咕的活态传承:

3.1通过品牌化战略构建多元传承的话语体系

过去艺人们在农闲时才会做上几个泥咕咕,售卖所得也仅能补贴家用。但当今杨记屯村的家庭泥塑作坊经过“品牌化”发展,也都有了品牌印记,例如“学海”、“蓝田”、“连顺”等等^[4]。作坊的品牌化发展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非遗传承人独领市场话语权、保护了普通艺人的创意和知识产权,而且品牌化趋势也是手艺人革故鼎新、走上自有风格的必要之路。凝结了个人智慧的泥咕咕经由品牌化的推广,在市场中不仅能够拓宽销路,更促进这项非遗百花齐放式地传承发扬,为泥咕咕在新时代重新注入生命力。

3.2结合当下情感与治愈的需求投射

现代生活中,“萌系”设计以稚嫩的视觉语言构建了“去压力化”的审美乌托邦,这既是对现实压力的情感回应,也是深层治愈需求的投射。萌系的核心在于通过符号消费与文化认同,将传统元素转化为现代流行符号,在商业化中实现文化价值的再生产。浚县艺人王居梅创作的皮老虎与泥咕咕同属地域民俗系统,其泥制与泥咕咕大致相同,外形添加羊毛造型、放大脸部表情,童真可爱又具虎威,捏动背后可发声,符合当下萌系审美,经“了不起的匠人”推广后倍受年轻人的青睐。泥咕咕的创新也可借鉴这一手法,首先保留夸张比例、彩绘特色、美好寓意的文化基因,同时将泥塑的体量缩小、保留互动性、增加便携性、与人们的日常搭配相融合。在泥塑的动态上可以与“歪头”、“窃窃私语”、“试探”等流行动作相结合,在保留泥咕咕民俗内涵的同时和谐地衔接流行文化。

3.3地域文化间的同构

黄河泥土滋养了一代代的中原人,孕育出了朴实厚重的民俗文化,除了泥咕咕以外还有流传千年的民族乐器——黄河泥埙。泥埙吹奏时声音古色古香、音效悠扬辽阔,直击心灵。在最初时先民用埙模仿鸟兽叫声来诱捕猎物,后来逐渐增加音孔,演化为吹奏乐器。泥埙整体结构呈蛋形,埙身带孔,圆润外观与泥咕咕的腹部造型相似,可以与泥咕咕同构为“泥土-声音”符号

体系。在具体制作上,可以将泥咕咕的“头部”演化为埙的吹口,保留其夸张的神态特征,同时以泥埙的椭圆体作为共鸣腔,实现形式与功能的统一。除此之外,河南博物院还将泥咕咕与镇馆之宝——妇好鸮尊结合创作,推出“咕咕版鸮尊”,完成了文物和民俗的跨界同构。论中原文化的造物历史,物与物之间链接了许多相同的造物哲学,因此在泥咕咕的文化遗产上,可以多与其他文化种类和器物造型进行有机结合,这不仅是对传统造型的现代化转译,更能通过功能创新重构非遗的生存语境。

4 结语

纵观泥咕咕的符号嬗变轨迹,好似一部镌刻在黄河故道上的民间文化编年史,其符号意义从“祭祀工具”到“文化符号”再到“商业产品”的流变中,经历了三重复合逻辑: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从实用符号、民俗符号,到商业符号的线性演变。在空间维度,从地域小传统(庙会)到国家大传统(非遗名录)再到全球文化市场的符号扩张。在文化韧性上,民间艺术通过“符号解构-转译-重构”实现基因传承。

究其符号流变的历史,泥咕咕符号意义的每一次转换,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需求、技术条件、文化风尚和经济模式的真实回应。这一符号演变过程有力地揭示了民间艺术在当代展现出的非凡适应力:泥咕咕并未在现代化浪潮中消亡或仅作为博物馆的标本存在,而是通过主动调整其符号功能与表现形式,完成了与当代文化的有机重构,成功实现了文化基因的传承与价值创新。泥咕咕这份包容并蓄也充分证明了传统工艺拥有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持久生命力的巨大潜能。

[参考文献]

- [1]张新词.农耕文明下的浚县“泥咕咕”起源考证与推演[J].农业考古,2012,(06):335-337.
- [2]王文析.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代表——浚县泥咕咕的传说故事、项目保护和现状[J].理财(经济),2020,(09):56-65.
- [3]胡鑫.“非遗”视角下浚县泥咕咕的现代保护及发展路径研究[J].艺术科技,2024,37(01):58-60+69.
- [4]王皎.浚县泥咕咕的蜕变:从靠庙会到靠品牌——探析民间艺术中的“作坊智慧”[J].中国艺术,2014,(03):126-127.

作者简介:

李林美(1999--),女,汉族,河南省焦作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艺术设计学。